

“低头族”隐患多

据《现代快报》报道,近日,家住江苏南京永阳镇的王大妈,因走路低头看手机,掉进了小区门前的窨井里,右脚多处骨折。为此,她将物业、维修师傅以及一名业主告上法庭。经法院判决,相比几名被告,王大妈自己担责最多。

如此结果多少有些让人惊讶,然而这也恰恰证明:如果不增强自身安全意识,外界的安保措施再怎么完善都等于零。如今不少人走路、乘车甚至吃饭都手机不离手,如此不分场合地与手机过分亲密,有时是对他人的不尊重,有时则容易引发卡绊、坠落等意外,有时还可能被不法分子盯上。“低头族”,们该醒醒了,别等搭上自身安全和性命才追悔莫及。

健康证也能买?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在北京市某体检中心,居然有人出售健康证,不用检查,不用抽血,只要交200元就能办一本真的健康证。拿着这本健康证到家政服务中心应聘保姆,有的家政中心根本不要求出示,有的则草草看了一眼封面就顺利“放行”。

在餐饮、家政等特殊行业,办理健康证已是基本规则,然而健康证办理标准不规范、渠道不统一,证件难以联网查询真伪等问题一直存在,客观上让一些人有机可乘,这也为相关服务的安全卫生带来隐患。相关部门应当尽快着手细化健康证分案,增加验证辨伪手段。

小学生学哲学

据《光明日报》报道,近日,江苏扬州梅岭小学西区校决定,今年秋季开设哲学课,并将其作为三至六年级学生的必修课,与语文、数学同等地位。此举一石激起千层浪。有人质疑,哲学晦涩难懂,儿童难以接受;也有人认为,哲学有益,启迪心智应从娃娃抓起。

前些年,有人质疑小学生连汉语拼音都没掌握好,学外语是否太早了,如今对小学开设哲学课的争论也不乏各种“殷切”考量。在提倡素质教育、创新教育的当下,学什么、怎么学其实并不该有一定之规,任何有益于学生身心发展的教育方式和方法都值得鼓励和尝试。只要有科学合理的切入方式和引导手段,能让孩子遇事不再诉诸经验直觉,而是多些理性思考,学点哲学未尝不可。

不合理。但要想让这一逻辑真正形成良性循环,其中的核心无疑在于,电视剧的质量、品质是否足够高。如果电视剧品质足够高、对观众具有充分吸引力,即便没有播插广告,每集电视剧前后播放的广告,仍能给电视台带来丰厚收入;反之,若电视剧质量不高,甚至堪称“烂剧”,那么即便允许播插广告,又能吸引多少广告商?据报道,尽管我国每年1万多集的电视剧产量已是世界第一,但“近一半没有平台播放”亦是事实。

这种背景下,电视剧制作部门不认真反思“有数量、缺质量”的问题,只想走“播插广告”的“捷径”,实在有些舍本逐末、诊不对症。

# 听证会有“戒备”:是开门纳谏的节奏吗

□本报评论员 林 琳



相关组织者更应该端正对听证会的态度和认识,听证会不是想开就开、想怎么开就怎么开,而是有《价格法》、《立法法》等相关的法律和规定作为依据;听证代表也好、媒体也罢,都不是来挑刺儿的,而是共同致力于相关决策的过程更公开透明,听证的结果更科学、更让人信服。

河南郑州的一场水价调整听证会近日成了新闻热点——据8月9日央广报道,

# 告别贫穷才能告别“无妈乡”

□舒圣祥

“无妈乡”是湖南省邵阳县黄荆乡的另一个称谓,那里有100多个“失母儿童”——据8月9日《中国妇女报》报道,该乡在校“失母学生”131人,其中母亲逃婚与改嫁的有116人。驱使母亲出走的原因不仅仅是贫困,还有家庭暴力、丈夫懒惰等。而这些出走的妈妈,不少都是被人贩子卖到黄荆乡的。

阅读“无妈乡”的故事,好像是在聆听一个遥远的传说,但它却是真实发生的,而且就在此时此刻。当“妈妈”这个世界上最温暖的称呼,成为一个地方孩子们的最大禁忌,当“你妈妈不见了”成为当地孩子们最敏感的话语,可以想象那样的童年有多么不幸,那样的成长该有多么欠缺,那样的人生又将有多么“营养不良”。如果没有得力的“救赎”和改变,“无妈乡”留给孩子们的将是怎样的未来?

当外界普遍将“无妈乡”想象为“母爱的本能被贫困击溃”时,记者的实地走访为这些出走的妈妈们正了名。貌似无情无义的抛夫弃子行为背后,隐藏着她们多少悲辛与不幸,她们只是尝试着给自己不幸的人生做一点改变,她们不是我们想当然的“坏女人”、“坏妈妈”。被人贩子拐卖到陌生而贫困的黄荆乡,嫁给一个好吃懒做毫无上进心的男人,还要时时遭遇各种家庭暴力,这种地狱般的日子没有不尽力挣脱的理由。

驱使母亲出走的,肯定不仅仅是贫困;该承担责任的,也绝不仅仅是那些母亲。这

此次听证的两套方案中,水价均有不小的涨幅,许多带着疑问赶往现场的记者被拒之门外,原因是没有事先报名,且媒体名额已满。而听证会现场门外,多名身着带“特勤”字样制服的人员以及多名民警的“把守”让气氛紧张、尴尬。郑州市物价局一官员事后接受采访时“涨价是政府的一个工作职能”的表态更成为舆论“槽点”。

客观而言,这场听证会之所以引起关注,并非某个官员不合时宜的某句话,而是它透露出来的一些紧张氛围。比如,不少记者被拒之门外。官方说法是,他们早就对听证会进行了公告,旁听要报名。所以河南电视台新闻中心等10多家媒体无法进入。比如,听证会门口那些足以把门完全封堵的保安和警察。比如,进入听证会现场采访的记者表示,媒体和听证会代表进入会场有不同的通道,媒体区



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反过来想,黄荆乡那些好吃懒做的男人,以及动不动就打老婆孩子 的粗鲁,又真的只是“坏男人”、“坏爸爸”的问题吗?恐怕也不是。最可怕的恐怕还是一种贫困,是让习惯了贫困的人们完全失去改变的希望,并且最终安于贫困。“无妈乡”那些丢了老婆的男人,似乎也是如此。当好吃懒做、暴打老婆成为群体性的现象,显然还有值得深思的因素。

经济的贫困,教育的落后,眼界的缺失,希望的破灭,凡此种种其实都可以用来解释那些“坏男人”、“坏爸爸”的异常表现。所以,“无妈乡”的问题,归根到底还是发展的悲剧。作为被发展遗忘的贫穷角落,尝试对“无妈乡”进行各种“归罪”,追问到底该怪“坏女人”还是“坏男人”,其实都没有太多意义。要改变现状,唯一的出路就是改变贫困的面貌,要么从外面引入“活水”,要么组织那里的男人“走出去”。

给予机会与自身勤劳,开阔眼界与重燃斗志,往往是改变的开始。扶贫绝不只是每年给点钱,让他们可以借此活下去。要让黄荆乡的孩子们拥有一个完整的家,在治懒、反家暴、打击拐卖妇女等方面完善制度当然重要,但是,当地贫困面貌如果迟迟不能改变,人们依旧安于贫困而看不到出路,出走的妈妈们很难再回来。



据《现代快报》报道,8月6日,一个题为“抵制金山湖萤火虫展”的帖子在镇江网友之家引发热议,截至8日傍晚已有近3万次的点击量。记者向主办方镇江文化旅游产业集团求证,对方回应称,所展示的萤火虫是外地一培育养殖基地供应的,不会伤害萤火虫。

如果这些萤火虫都是被活生生捉来的,只为商家搞噱头赚钱、游人观瞻一乐,未免有些残忍。这种萤火虫展,不少地方都举办过,每一次都会引发质疑,不管是养殖的还是野生的。其实,表达和象征爱情的信物可以有多种,为什么有人偏偏要恋萤火虫?“没有买卖就没有杀戮”,用它来说萤火虫可能有些小题大做,但道理是一样的。自然界的物种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人类实在不应该为了自己的私欲随意去增加或者减少它们的数量,打破某种平衡。

□李法明/图 林琳/文

首先,插播广告此前早已被广电总局明确禁止,并且得到了广大电视观众的支持。一旦恢复,不仅会损害广电总局要求应有的严肃性,显得“朝令夕改”,而且会严重违背公众期待。

其次,就电视剧市场存在的问题来看,恢复插播广告也没有多大的现实合理性和必要性。“购剧经费吃紧、经营困难、收视率造假”等问题,是没播插广告造成的吗?如何让电视台购剧经费“不再吃紧”、“经营不再困难”,电视台更应从自身节目的编排和质量上找原

因,而不能把希望完全寄托在广告上。

很明显,恢复电视剧中插播广告固然能暂时增加电视台的广告收入,但从长远来看,这种建立在破坏“剧情完整性和收视连贯性”基础上的收入增加,未必可持续——因为出于对播插广告的强烈反感,加之“网络和新媒体”提供的更丰富选择,越来越多的观众势必会选择放弃通过电视台观看电视剧。此前,有报告显示,一些地方的电视机开机率正在逐年下降。

从一般经营逻辑角度,希望通过增加广告收入缓解“经营困难”的逻辑,并没有太多

做则已,要做就要动真格、见实效。“他生前多次说,关系老百姓切身利益的事,千万马虎不得。”杨杰说。

从1954年到1960年末,尕布龙曾在黄南藏族自治州河南县担任领导职务。当时,河南县境内的河曲草原是青海草原鼠害最严重的地区之一,鼠害面积一度占全县可利用草场一半以上。

在尕布龙指挥下,旷日持久的“灭鼠战役”打响了。

据尕布龙当时的通讯员郭多回忆,尕布龙在河南县的十多年里,每到灭鼠时节,在草原上一呆就是一两个月。“晚上就和牧民挤在帐篷里,同草装在袋子里当枕头,拿河里的水拌点炒面,就是三餐。”

经过努力,河曲草原生态渐渐恢复。在尕布龙影响下,河南县对灭鼠一直没有放松,上世纪90年代初,这里成为我国北方第二个草原无鼠害县。

1993年,尕布龙从青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位置上退了下来。他给自己找了一份新“工作”:义务植树。

“风吹沙飞无鸟影,下雨泥石落西宁”。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青海省会西宁南北两山,树木覆盖率仅为7.2%。冬春,黄沙漫天;夏秋,泥沙俱下。

1989年,青海省正式启动西宁南北山绿化工程,尕布龙成为工程指挥部顾问,四年后义务担任常务副总指挥。“老爷子常说,我们种树,老百姓看在眼里,盼在心里,要干就必须干好。”时任尕布龙通讯员的朱洪杰回忆道。

此后十年间,每到春夏时节,尕布龙总是早上六七点上山,晚上八九点下山。实在太晚了,就在山上和民工一起休息。“我是当兵出身,当时才十八岁,身体都感觉吃不消。”朱洪杰说。

整整十年,尕布龙每年在山上的日子有近300天。从除夕到大年初三,尕布龙都会亲自上山值班。“每当万家团圆的时候,老爷子却一个人守在林区,想起来让人感动,也让人心酸。”南北山绿化指挥部办公室专职副主任张奎说。

2001年,尕布龙荣获全国保护母亲河行动领导小组颁发的首届“母亲河奖”。

尕布龙走了,却仿佛从未离开。

“风沙飞”的故事,在百姓中传颂;河曲草原曾经的“黑土滩”,如今绿草如茵;南北两山纤细的树苗,早已亭亭如盖,郁郁葱葱。

“老百姓就是他的天,老百姓就是他的地,老百姓就是他的生命之根。”青海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干部、传记文学《尕布龙传》作者德布·陈列奥赛说。

(据新华社西宁8月10日电)

# “老百姓就是他的生命之根!”——追记青海省已故原副省长尕布龙

最美基层干部

新华社记者 陈凯 庞书纬 孙铁翔

2011年10月8日,一个降霜的秋日,一位85岁老人,在青海西宁静静地走完了一生。

老人去世近三年后,青海当地媒体评选“影响青海历史人物”,原本不在候选人名单中的他,却在短短几周内受到数千群众联名推荐,最终高票当选。他,就是青海省原副省长尕布龙。

树木参天,是因为根深植大地;丰碑巍峨,是因为立于人民心中,尕布龙已化作高原人民心中永不磨灭的巍峨丰碑。

“心里装满了老百姓的疾苦”

“省城有个好乡亲,他就是副省长尕布龙;他家是农牧民办事处,一天接待人无数……”

这首传唱在百姓间的青海花儿,歌颂的是尕布龙家中的“牧民店”。

上世纪70年代初,尕布龙离开工作近20年的黄南藏族自治州,来到省城西宁担任省畜牧局局长。

“他特别关心牧区老百姓,老百姓也信任他。到西宁之后,老百姓来看病经常在他家歇脚,一来二去,他家就被人戏称‘牧民店’,不仅一分钱不要,谁要是看病没钱,他还会出钱

(上接第1版)

由于“黑车”泛滥,由此引发的纠纷和投诉也频繁发生。近日,有市民投诉反映兰州西客站内“黑车”横行、漫天要价,在请求城运部门查处的同时,还提出了多条建议。但这位市民最后却得到了一条城运部门自我表扬的“神回复”,回复通篇都是该部门查处“黑车”的成绩单。市民无奈之下,只能致函当地媒体,此事公开披露后引发舆论一片哗然。

市民王伟在网络上评论认为,执法部门失去了市民的信任,由此导致了“黑车难治”

的恶性循环。

8月6日,记者在兰州市定西路附近采访,谈起几天前发生的围堵城运执法车辆的事件,有当时在现场的市民告诉记者,当晚的执法并非没有瑕疵,“遇到执法人员后,‘黑车’司机弃车而逃,执法人员非要将乘客拉来拉去问个究竟,如此执法只能激化矛盾。”

对此,当地舆论认为,“黑车”的大量出现,暴露出的是客运出租业管理的缺陷和正规出租车运力 的不足,变堵为疏,加大正规出租车数量才是遏制“黑车”的根本之策。

# 刘老庄连:82烈士书写悲壮抗战传奇

不朽的英雄番号

新华社记者 梅世雄

济南军区第54集团军某红军师“叶挺独立团”装步2营4连副指导员李彩慧,来自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刘老庄乡。

李彩慧说,4连还有另一个著名的称谓:刘老庄连。

“用一个村庄名为一个连队命名,在我军历史上并不多见。”入伍来到用自己家乡命名的英雄连队,让李彩慧感到十分荣耀。

荣耀的背后,是82烈士书写的悲壮抗战传奇!

1943年3月,日军突然集中兵力对我淮海地区展开大扫荡,妄图合围六塘河北岸的淮海区党政领导机关。新四军第3师第1旅第19团第4连奉命组织防御,掩护主力部队和领导机关安全转移。

为了拖住敌人,争取时间让领导机关和群众安全转移,4连连长白忠才和指导员李云鹏经过商量,决心放弃突围,固守阻击敌人。

1943年3月18日,日伪军集中所有的山炮、92步兵炮、迫击炮、掷弹筒,对4连阵地进行毁灭性炮击。

推进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

(上接第1版)六是明确入廊要求,已建设地下综合管廊的区域,该区域内的所有管线必须入廊,既有管线应根据实际情况逐步有序迁移至地下综合管廊。七是实行有偿使用。入廊管线单位应向地下综合管廊建设运营单位交纳入廊费和日常维护费。八是提高管理水平。管廊建设运营单位与入廊管线单位要分工明确,各司其职,相互配合,做好突发事件处置和

应急管理等工作。九是加大政府投入。中央财政要积极引导地下综合管廊建设,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进一步加大地下综合管廊建设资金投入。十是完善融资支持。鼓励相关金融机构加大对地下综合管廊建设的信贷支持力度,将地下综合管廊建设列入专项金融债支持范围,支持符合条件的地下综合管廊建设运营企业发行企业债券和项目收益票据。

(新华社郑州8月10日电)